

# 国内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 积极成果评述

罗 萍

**【提要】**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社会学、经济学开始研究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由温饱走向小康的中国人迫切需要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评估小康生活。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以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发展,促进了中国小康生活质量建设。近十余年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取得了大量积极成果,建立了多种有价值的理论模型,提出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同时也有某些不足之处。

**【作者】** 罗 萍 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综观国内学者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不少合理的、积极的成果。这些研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本文试作一简要评述。

## 一、分层式结构理论模型

林南等在对天津市调查资料分析过程中,建构并验证了分层式结构理论模型(林南等,1987)。认为生活质量研究中有三个主题,即生活质量的结构、导因、效果,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层次。首先要建立的是生活质量的结构和指标,有了既定的结构和指标,才能进一步探讨这些指标的导因和后果。以往的研究没有对生活各方面做结构分析的。从统计上说,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用对生活整体的满意度来着手分析。林南等认为生活的各方面不是相互隔离而是相互联系的。有些实际生活面可以由一个层次较高的生活大面来代表,在这一较高层次中的各生活大面也是相互联系的,这些生活的诸层次、诸方面,以及生活的各个具体项目可以最终形成一定的结构,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分层次存在的。这种含有高层次的结构能更好地表现或反映生活方面的真正结构。林南等就尝试着建立生活质量指标分层式结构理论模型。

林南等的结构模型是基于1985年天津市千户户卷调查中有关生活满意度资料的实证性统计分析。通过专家访谈和资料阅读初步选定了22个具体指标,构成结构模型的第一结构层面。使用因素分析法对22个具体指标进行归类后得到5个主要因素(即主要生活面,包括工作的社会特征、工作的经济特征、家庭以外的关系、家庭、环境和业余生活)构成第二层次的结构。为了得到第三层次的结构,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式分析法对5个因素和22个具体指标进行分析运算,发现可以把5个因素归并为更大的3个生活面(即工作、家庭、环境)构成第三层次结构。为了证实第三层次的结构即能代表生活质量的总面,再次运行结构方程模式,分析结果支持了林南等人最初的设想。这样,一个有着三个结构层次并经实证资料验证的生活质量结构模型便被建立起来。

相对于目前国内研究而言,林南等人建构生活质量结构模型的方法有不少成功之处。他们选定了22个能反映生活质量状况的具体指标,建立了生活质量的第一层结构。采用七点式量尺对22个指标进行测量,得到各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并把22个具体指标应用因素分析方法,归并为5个主要方面,建立了生活质量结构的第二个层面。虽然在因素分析中采用正交法,但这5个方面仍不完全独立(这可能与最初22个具体指标的选取有很大关系,如它们之间有的相互包容,数量上不平衡,即各方面项目数量相差悬殊等),可以再合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式方法结合卡方检验或吻合度检验(因卡方检

验易受样本量影响,采用吻合度检验),可以检验前面因素分析法得到的因素与具体指标是否合乎实际数据,同时也可发现进一步合并5个因素的办法。经过结构方程模式的运行,显示出的图表正好满足两个要求,即一方面显示出这5个因素与原22个具体指标关系顺序与因素分析的结果一致;另一方面也从5个要素的相关系数大小排序中找出了合并为3个更高层次因素的依据。

将三大因素作为第三层次隐性变量,5个因素作为第二层次隐性变量,22个具体指标作为基本显性变量再次运行结构方程模式,目的仍然与第一次运行该程序相同。在得到吻合检验支持后,可以确定三大生活面因素可以作为生活质量的总面。使用同样方法将三大生活面归结为生活质量后再运行结构方程模式,得到吻合度支持后,基本完成了生活质量结构模型的建构工作。

由此可见,此项研究基于调查对象的代表性,实证资料的可靠性,生活质量的分层式结构模型的科学性,构筑了分层式结构理论模型。

## 二、三级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理论模型

卢淑华、韦鲁英根据北京、西安、扬州市抽样调查资料,探讨生活质量模式,除引入客观指标外,增加了参照标准对主观生活质量指标的影响这一项,并通过中介评价指标将客观指标系列进行综合,形成了三级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卢淑华、韦鲁英,1992)。该模型可以增加对生活满意度解释力。

构建三级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模型的主要思路为:(1)客观指标位于模型的源头,是产生领域满意度和主观评价之本。(2)在考虑了中介主观评价指标对主观感受(满意度)的作用后,客观指标对主观感受的直接作用可以被忽略。(3)主观评价指标除受客观指标制约外,还受参照标准、人口特征等诸因素的影响。因此,主观评价不是对客观事实的简单概括和综合。中介主观评价标准建立在客观指标基础上,客观指标通过中介主观评价指标作用满意度。中介主观评价指标本身受参照标准影响,参照标准又受人口特征影响,所以中介主观评价指标集主观客观二重性后制约满意度。这是卢淑华、韦鲁英关于北京、西安、扬州市生活质量研究的最大贡献和积极成果。

验证三级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理论模型是通过设置中介评价指标和忽略客观指标对满意度具有直接作用力建立的。中介主观指标的建立是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客观物质生活条件是主观满意度的物质基础,它对满意度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影响满意度的客观因素是多维的,需要对客观指标进行一定的归纳和综合。因此,设置了中介评价指标。评价指标是人们对一系列客观条件进行综合评判的反映,可以被看作是影响主观满意度的直接原因。它位于主观满意度与客观指标之间,故称中介评价指标。由于中介指标影响满意度时已经或要受客观条件制约,所以它具有二重性。因为有了中介指标,所以可以忽略客观指标对满意度的直接作用力。为了研究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的作用机制,特别是客观指标是否可以用主观评价指标来概括,在作保留或忽略客观指标对满意度直接作用力模型加以比较后发现,保留直接作用力模型的判定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优于忽略直接作用力模型。这就验证了客观指标除了通过主观评价这个中介变量来影响满意度之外,它对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可不予考虑,即说明假设“客观指标→评价指标→主观满意度”这个思维归纳过程是正确的。因此,这就验证了三级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理论模型的正确性。

## 三、因果结构理论模型

林南、卢汉龙在对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研究中,以“社会环境”作为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指标联系的中介,提出并验证了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指标的“因果结构模型”(林南、卢汉龙,1989)。它将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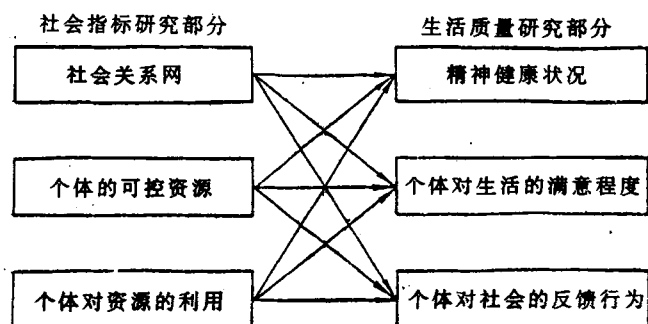


图 社会指标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指标理解为对社会整体或其成员有意义的社会环境特征。而生活质量则是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这种评价包括认知(生活满意度)、情感(精神上的幸福感)和行为(反馈性公益行为)三个层面的评估体系。通过对上海市居民生活调查,将生活质量这三个层面的评估和外源性的社会环境条件作因果结构分析,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结论。

将社会指标和生活质量两项研究结合起来,这一整合性研究的实质是探讨个体的社会生活条件对个体评价的影响问题。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科学知识的结构体系。这个模型有益于我们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深刻把握。它的现实意义是:认识到输入资源(社会环境特征)与输出评价(认知、情感、行为)之间的结构联系,这就使我们认识到可以采取各种社会的经济的措施,以期在相对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达到最大效果的生活满意度和精神文明水准。经因素分析,从相关系数较强和因子承担系数较大的指标中筛选出几个主要的指标来代表各个理论概念,结果社会环境条件方面取得 19 类指标,生活质量方面取得 13 类指标。以 19 类外源性的社会指标为输入自变量,13 类社会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为输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从  $R^2$  所显示的解釋度来看,社会环境指标对生活满意度的解釋度最高可达 34% 以上,对精神健康状况的解釋度达到 15%,对反馈性行为的解釋度为 7%~9%。这是两大领域整合研究的一种积极成果。

社会指标在微观层次上指对社会个体的生活有意义的那些社会环境条件,它对于生活质量来说又可以作为输入资源。生活质量的研究,即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就是输出结果。这两类研究可以看成是资源条件与系统后果的关系。在这里,社会指标即是那些对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起积极或消极作用的社会环境计量,这就将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连成一个因果系统。社会指标研究社会关系网、个体的可控资源、个体对资源的利用;生活质量研究精神健康状况(情感)、个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认知)、个体对社会的反馈行为(行为),它们之间存在多因多果、复合因果联系,即社会指标体系中的社会关系网、个体可控资源、个体对资源的利用分别影响生活质量中的情感、认知、行为(见图)。

#### 四、经济支配权→婚姻、家庭满意度理论模型

卢淑华关于中国城市“经济支配权”影响婚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的理论模型(卢淑华,1992)得到北京、西安等地抽样调查资料验证,其结论证实这个模型是优良的、可靠的。模型中反映家庭经济支配权“是否因用钱意见不和”以及反映家庭义务的“家务满意度”等问题,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研究结果表明:(1)影响家庭生活质量的首要因素是婚姻质量,它有力地证实了目前认为当今中国家庭关系转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的论断的正确性。(2)影响婚姻质量的主要因素:一是“是否因用钱意见不和”;二是“配偶理想程度”;三是“家务评价”;四是“配偶理解程度”。

影响婚姻生活质量的因素是多维的,影响家庭生活质量的不是婚姻之外的诸如子女、亲属等外延关系,而是婚姻双方对自身婚姻质量的评价。

卢淑华的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生活生活质量分析研究方法的特点是:(1)采用间接分析法,而不是直接询问法。对社会现象,直接询问人们往往带着理论上的或社会应允的价值判断来回答,和自己实际情况有时并不挂钩。婚姻家庭生活具有私密性,如果直接询问,回答不真实的概率较大,有时甚至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因此,直接询问法不宜在婚姻家庭研究中应用。间接分析法即对涉及个人家庭生活隐私的问题不直接提问,而将该问题转化为一些与之有联系且能(或易于)直接测量的变量(它们本身不涉及隐私),最后使用数字工具进行分析,达到了了解隐私问题的目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全面测量每一个被访者在婚姻家庭生活质量各方面的指标,包括各种影响因素的指标,然后建立经验模型,其中包括因素的筛选和主次的确定。具体采用方差分析和逐步回归,方差分析可以确定某些因素 $x$ 是否确实影响到因变量 $y$ ,而逐步回归则可以筛选出较为重要的、起主要作用的影响因素。间接分析法在决定因素的取舍和重要性时,是根据被访者在各方面所表现的实际状况,通过数据间的定量分析,将潜在的因果联系和权重体现出来,从而排除了主观价值观念的干扰。这种方法在对社会现象研究时是十分必要的。(2)使用数学手段对影响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变量做出取舍。首先设计一系列以认知层次为准则的满意度。测量采用七点式李嘉图尺度。以家庭生活满意度或婚姻满意度为因变量,经过方差分析和逐步回归,求出影响婚姻满意度和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变量。

90年代武汉市的一项调查(易松国,1997)所验证的理论模式与卢淑华研究结论差异较大。该调查资料显示:影响城市婚姻质量的主要因素依次是“配偶理解程度”,承担系数为0.6966;“家庭关系”承担系数为0.1169;“夫妻是否为用钱闹不和”,承担系数为0.0761。

卢淑华的研究是在80年代后期进行的,当时整个社会还处于温饱阶段,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夫妻间因用钱意见不一致而产生矛盾就突出一些。武汉市的调查是90年代中期进行的,整个社会在向小康迈进,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夫妻间经济矛盾相对减少。人们在追求生活质量,而婚姻生活是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因此“配偶的理解”、“家庭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经济问题退居其后。笔者认为,分层式结构理论模型、三级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理论模型、因果结构理论模型、经济支配权→婚姻家庭满意度理论模型是目前国内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中理论上的建树和积极成果。对目前和今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都有启示和指导作用。

## 五、值得注意的问题

国内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值得引起今后研究注意或可借鉴的东西很多,可以说这也是一笔宝贵财富。

### (一) 保持生活质量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益增长速度相协调

在《建国40年社会发展指标的评价》中,朱庆芳(1989)将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指标5个子系统之一,并作了建国40年来综合指标分析。为便于比较,将建国后36年分成两个时期,以1953~1978年26年作为第一个时期,以1979~198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0年作为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综合指标生活质量年平均增长为3.8%,第二个时期年平均增长为10.1%,从1953~1988年平均每年增长为5.3%;而经济效益第一个时期年平均增长1.6%,第二个时期年平均增长3.6%,1953~1988年平均每年增长2.6%。从这些指标中可以看出两点,其一,改革后10年的生活质量指标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改革前26年;其二,生活质量指标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效益的增长,两者不协调,存在消费需求膨胀现象。我们应该保持生活质量指标增长与经济效益指标提高相适应,超前消费归根结底会抑制国民经济发展。因此,朱庆芳还提出要建立一套社会问题的警报指标体系,定出警戒线,通过对数据的动态分析及时提出预警。以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这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 （二）生活质量指标研究重点应放在对经济因素的满意度上

潘祖光(1994)在《人口生活质量研究综述》中指出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中国生活质量研究重点应放在客观指标的研究上。冯立天(1995)在《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中认为,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倾向研究客观生活质量,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倾向生活质量的改善投向主观感受方面和生活幸福的总体感受。因此,结合中国国情,确定以客观指标为主轴,同时辅以必要的主观指标的较为全面的综合指标是必要的。

## （三）生活质量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研究融合和协调趋势

冯立天(1995)在关于北京小康生活质量综合指标的研究中提出:小康生活质量指标不仅限于规定客观指标,也应当规定必要的主观感受指标,也就是要适当考虑从社会的角度来设计或计量小康生活质量问题。

潘祖光(1994)指出,国内外学者达成共识的是:生活质量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研究日益融合和协调起来。天津、上海、北京、西安、扬州、厦门、武汉等市生活质量指标实证研究都反映了这一趋势。由此决定了生活质量的评估方法有三种,即主观评估法、客观评估法、主客观指标结合评估法。

郑晓瑛(1996)在《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评估述论》中指出,完善的评估体系应该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等多方面因素。

卢淑华、韦鲁英(1992)在《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研究中认为应偏重对人们主观生活感受方面的研究。其理论根据是经济的高收入并不意味着生活的高质量,富裕并不等于幸福。因此,将生活质量的研究转向对人们生活体验等主观指标的研究是必要的。“差距解释理论”因“参照标准问题”而出现主观感受与客观指标不一致,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特征会影响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由此卢淑华、韦鲁英提出设置“中介评价指标”建立理论模型以考虑到主观感受的影响力。她们认为影响主观指标的制约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客观因素,即社会存在,它是影响生活质量的物质基础。二是对生活质量进行主观评价时所持的参照标准。这个参照标准会因自身的经历、见识,亲友的状况,本人的价值观、期望值,甚至信仰、个性而有很大不同,由于参照标准的存在,使得主客观指标之间可能产生分离。

## （四）生活质量指标跨文化研究问题

林南、卢汉龙(1989)在《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项研究》中得出这样的认识,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因果结构模型显示出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因为,这种结构模型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表现的因果联系结构上的异同将有助于认识各文化的异同以及文化因素在评估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因果结构理论模型的研究可以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一种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

潘祖光(1994)在《人口生活质量研究综述》中认为,生活质量的跨文化比较将成为今后生活质量研究的主要方向,它将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赵细康(1997)在对广东省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主观评价分析中指出,跨文化、跨群体比较研究时,为使比较结果客观、真实,宜采用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标或以客观指标为主。因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群体评价时所依赖的参照标准有可能不同,不确定性较大。而在卢淑华、韦鲁英(1992)的研究中认为,由于各人所持的参照标准不同,可能出现高发达地区低满意度,不发达地区的高满意度现象。因此用主观指标值作为跨文化、跨地区的横向比较,意义是不大的,但对同一地区进行纵向比较时有一定参考价值。

跨文化比较研究是必要的,但必须主要放在客观指标的比较上,因为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人口特征、参照标准不同,主观评价差异较大。而客观指标相对而言确定性较大。

## （五）研究行为层次上评价的重要性

林南等(1987)的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指标因果结构理论模型把生活质量的计量包括为个体在情感、认知和行为这三个层面上对生活的评价和总结。“情感”即精神健康状况,“认知”即个体对生

活的满意程度,不少学者都已经注意到对这两方面的研究。但“行为”层次上评价研究则鲜有学者尝试过。林南等从个体对社会的反馈性行为研究生活质量,即是将个体对社会的反馈行为作为评估生活质量的标准是有见地的。他们把反馈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期望型的反馈行为,如在公共汽车上让座;另一类是自觉型的反馈行为,如义务打扫环境卫生。在一个生活质量评估较高的社会里,公民积极的反馈行为会较多;相反,公民的消极反馈行为会增加。

林南、卢汉龙(1989)在上海市居民生活调查中认识到社会环境提供的资源影响生活质量时,同时还要看到这种影响有正负两方面,如生活中不幸事件给生活质量带来的就是一种负资源,给生活质量带来负面影响。不仅如此,对社会环境提供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不仅包含着对静态社会资源的认识,还包含着对变动着的社会资源,例如对偶发性较强的生活事件的认识。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 (六) 影响婚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及其现实意义

卢淑华(1992)研究了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生活生活质量。在婚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中显示:“是否因用钱意见不和”的承担系数,北京为 0.776,西安为 0.750;“配偶理想程度”承担系数,北京为 0.135,西安为 0.194;“家务评价”承担系数,北京为 0.124,西安为 0.174。“是否因用钱意见不和”涉及的是“经济支配权”问题,它是影响婚姻满意度系数最大的一项。夫妻一旦因“经济支配权”产生磨擦,对感情的伤害比其他因素要严重的多。因此夫妻如何处理经济问题是影响婚姻满意度的关键。诚然对武汉市的研究所提出的“配偶理解程度”、“家庭关系”对婚姻满意度影响更大的理论模式是值得引起目前占 70%左右的核心家庭注意的问题。由此也启示我们,生活质量的评估指标是动态的,不可能一成不变。

## 六、启示和不足

### (一) 启示

1. 倒置分层式结构模型可以用少量几个主要生活面评估生活质量。林南等人的研究证明:生活质量是由 22 个具体指标表示的,22 个具体指标的结构层次表明可以归类为 5 个主要生活面,进而归类为 3 个生活大面,因此我们就可以用 3 个生活大面,即工作、家庭、环境的综合指标来测量(评估)生活质量,或者至多用 5 个主要生活面来评估生活质量。这就使生活质量的评估变得简单方便。

2. 中介指标可以综合主客观指标对生活质量的影晌。中介指标具有双重特性,因此,通过中介指标可以综合反映众多客观指标对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制约作用。这也会使生活质量的评估指标简单,操作方便。

3. 充分认识社会环境对生活质量影响的重要性。从因果结构模型中可以看出生活质量基本上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诚然,林南等人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指人文环境和资源环境,而没有涉及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环境。其实它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客观环境对生活质量的影晌和制约。环境意识与生活质量意识同等重要。

### (二) 不足

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同时也有不足:

1. 尚缺乏有影响的理论模式。国外影响比较大的理论有:坎贝尔的“期待—调整”模式和差距解释理论;贾斯特的“经济模式”;古瑞的“精神健康取向”以及罗斯托的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分类;欧美的大众生活福利方面的研究等等。目前中国除本文概述的林南等的“分层式结构理论模型”、“因果结构理论模型”;卢淑华等的“三级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理论模型”、“经济支配权→婚姻家庭满意度理论模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理论模型。诚然这四个理论模型也有待于完善、充实。

2. 缺乏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是零星的、点滴的、分散的、不同时间的,不成系统,

也不成规模,各自的调查内容和资料分析方法各异,不具有全国代表性。

3. 实证调查的样本量不够。由于经费和研究人员精力所限,实证调查的样本量不大,千万人口以上的北京市,500~600的样本容量其代表性是极其有限的。

4. 应考虑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与生活质量提高相适应。

总之,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需要权威机构的统一布署,统一行动,需要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民俗学家、哲学家的通力合作,需要学术界和政界的共同努力。而目前只在社会学界引起一定注意。另外,国家统计局在编纂各类统计数据时的不全面,缺少连续性等问题的存在,也使全国性的生活质量客观指标研究受到很大局限。

## 参考文献:

1. 林南、王玲、潘允康:《生活质量的结构与指标——1985年天津千户户卷调查资料分析》,《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
2. 林南、卢汉龙:《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模型探讨——关于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项调查》,《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3. 卢汉龙:《来自个体的社会报告——上海市民的生活质量分析》,《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1期。
4. 叶南客:《苏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评估与提高战略》,《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5. 卢淑华、韦鲁英:《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6. 卢淑华:《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生活生活质量分析——根据北京、西安等地的调查》,《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4期。
7. 潘祖光:《人口生活质量研究综述》,《人口学刊》,1994年第5期。
8. 冯立天:《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6期。
9. 胡荣:《厦门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10. 凤笑天、易松国:《武汉市居民生活质量分析》,《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
11. 周彦杰:《北京小康生活质量研讨会综述》,《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3期。
12. 冯立天、陈再华:《北京不同年龄段城市人口生活质量差异性研究》,《人口研究》,1995年第2期。
13. 易松国:《影响城市婚姻质量的因素分析》,《人口研究》,1997年第5期。
14. 赵细康:《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主观评价分析》,《人口与经济》,1997年第6期。
15. 郑晓瑛:《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评估述论》,《人口研究》,1996年第4期。
16. 朱庆芳:《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及2000年目标的综合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17. 社会发展和社会指标课题组:《建国40年社会发展指标的评价》,《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6期。

(本文责任编辑:朱 犁)

---

## 欢迎订阅 2001 年《人口与经济》

《人口与经济》是国内外人口学界公认的国家级人口专业刊物,1980年创刊以来,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刊方向,及时反映人口领域及其交叉学科的最新学术成果,传播计划生育工作先进经验,在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积极探索,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人口与经济》2000年再次被评定为“人口学类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2001年将扩版为80页,仍为双月刊,单月25日出版,胶版精印。国内每册定价为8.00元,全年6期48.00元。

《人口与经济》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国内邮发代号:2-252,国外代号:BM1006。国外订户请与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联系。未能在邮局订阅到本刊的读者,可汇款到编辑部邮订,定价不变。编辑部地址:100026北京朝阳门外红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与经济》编辑部,电话:(010) 65976473;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朝阳区八里庄分理处;户名:人口与经济编辑部;账号:144295-95。